

唐代文學研究

中國唐代文學會 西北大學中文系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主編

唐代文學研究

中國唐代文學史 詩賦文學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主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唐代文学研究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

(第一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字数: 36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

ISBN 7-203-00384-8

I·25

定价: 4.05元

告 读 者

——代 序

傅璇琮

《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现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和大家见面了。

《唐代文学研究》的前身是《唐代文学论丛》，《唐代文学论丛》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会刊。我因为在学会中担任一些职务，对《论丛》的事务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乘现在由《唐代文学论丛》改刊为《唐代文学研究》之际，向读者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

《唐代文学论丛》原名《唐代文学》，于1981年4月出版，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与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合编。出版后反映颇佳，印数愈万，迅即告罄。这是因为一方面，西安是唐代长安旧地，在西安出版唐代文学研究的书刊，当然有一定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四人帮”粉碎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术空气渐浓，好象春回大地，古典文学界颇有一种情满于山、意溢于海的态势，有这样一个专门的断代文学研究，耳目一新。于是下一辑（1982年第一期）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正式定名为《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5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西安成立，经过讨论，理事会将《论丛》作为学会会刊，仍由西北大学中文系唐研室编辑，学会正副会长任正副主编，常务理事为编

委。作为第一期会刊的《论丛》（即总第三辑），于1983年5月出版。1984年8月，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兰州举行，这届年会进一步明确了《论丛》的宗旨，希望加强学术性，主要发表理论研究和考证、资料性的文稿；同时相应地对编委作了调整。在此之后所编的两期（总第八、第九辑），确实是贯彻了第二届年会对会刊的要求的，质量显著有了提高，所载文章普遍得到好评。

总计从非正式出版的《唐代文学》起，到第九辑《论丛》，共出版十辑。这十辑所刊载的文字约250万，各类文稿400多篇。其中不少理论探讨的文章，在国内外研究界有相当的影响，一些考证、资料性的文章，也受到重视。据了解，日本、美国以及东南亚的唐代文学研究者，颇注目于此，他们有的每期必购，有时不能及时买到，则辗转托人，期于必得。国外及港澳一些图书馆，向西北大学函购或提出交换者，则更为频繁。建国以后近四十年中，在中国学术界，专门的断代文学研究书刊能出版十辑，历时数年，这还是唯一的一种。作为唐代文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对此我是很受鼓舞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学术繁荣、研究自由的明白无疑的标志，当然更是唐代文学研究兴旺发达的好兆头。不少学术界的朋友与我是有同感的。

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唐研室的同志们为《论丛》所作的贡献。他们大多是中青年的学术工作者，有志于在唐代文学研究中作一番事业，这几年来他们所发表或出版的论著的确也表明了他们的实力。但是他们肩负重托，接受《论丛》的编辑，一连串繁杂、琐细的事务就跟着来了。看稿、改稿当然不必说，与作者联系，跑工厂、看校样、寄送样书，在在都要化费劳力。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出版学术性的书刊并不象在光华流利的大道上漫步，可以那样轻松自得；出书过程中的种种曲折，难以尽道，到后来几乎每一辑都要与各方几经交涉，才得与世人相见。他们在各自所要完成的教学和研究任务之外来做编辑

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奉献。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的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几位编辑同志，他们除了差不多与唐研室同志一样辛劳之外，更需要做大量的事务性工作，有时连续几天奔波于出版社和印刷厂之间，还要与财会部门费精劳神、唇敝舌焦地交道。可以说，每一辑的《论丛》都倾注了唐研室与陕社编辑部的心血。

现在改名为《唐代文学研究》，还是继续前一时期的方针，不过学术性更强调一些。关于唐代文学，可以做多方面的工作。大量普及性、知识性的工作是很需要的。近年来唐诗鉴赏的文章，在读者中，特别是在青年中，很受欢迎。把我国古典诗的精华介绍给今天的读者，让他们对唐诗蕴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获得丰富的认识，这本身就是一项开创性的文化建树。另外，象《唐诗今译集》那样，对古代文学与当代创作怎样沟通，也是极有意义的尝试。不过，我们想《唐代文学研究》着重于做另一方面的工作，那就是发表一些比较专门的文章，或者说面比较窄的研究文章，这当中可以有理论探讨，也可以有资料考证，而从目前情况看来，后一方面恐怕会更多一点。比起轰轰烈烈的什么“热”来说，这些专门性的文章会是比较寂寞的。学术工作就是要安于寂寞，而且，对于学术工作者来说，能相安于寂寞未始不是一种美德。

我们希望《唐代文学研究》不是以量取胜，能够一年出上一辑，或者两辑，也不错了。这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似乎受当代文学创作一种风气的影响，追求一种量的发展。我认为，我们不必跟那种一年写一个长篇、七八个中篇、十几个短篇赛跑，精神产品最终是要看质量的，有质量就有数量，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数量，古往今来，莫不如此。今后，《唐代文学研究》似还可登载一些确实下过工夫，但面实在过窄，或较为冷僻，或字数过多，总之，不大能在别的地方发表的专题性学术文章。

我在这里也要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大家知道，出这样的研

究书籍，在经济上是要亏损的，而从目前出版体制来说，这将对出版社的工作造成困难。但是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毅然作了承诺，使我们的研究有了一个可靠的后盾。我认为山西社的同志们是有远见的。自有近代意义的出版社以来，中国出版界自本世纪初起就有一个好的传统，那就是出版社自办刊物，或较长期地出版一种或几种有影响的书刊。我们不是一想起《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就想起商务印书馆来吗？论述中国近代文化史能不提到它们吗？书刊实在是出版社联系作者、开辟稿源、在读书界造成影响的一个很好途径。我们希望，唐代文学研究者能与山西社的同志密切合作，这方面的前景是相当广阔的。

本辑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与山西人民出版社合编，具体的编辑工作仍是由西北大学中文系唐研室做的。今后编辑部的工作如何进行，学会理事会将在适当的时候讨论决定。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唐诗学史之一瞥·····	陈伯海 (1)
佛教与唐代的文学·····	孙昌武 (32)
唐文述略·····	高 文 (46)
论唐人传奇的素材来源及演变·····	李宗为 (64)

对陈子昂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罗时进 (85)
张九龄与盛唐山水诗·····	陈建森 (104)
论骆宾王文章的艺术和思想·····	杨 柳 (117)
论柳宗元诗中悲剧性格特征·····	李育仁 (142)
贾岛新论·····	赵 剑 (158)
唐五代诗僧及其诗歌·····	徐庭筠 (176)

王维生年新探·····	陈铁民 (194)
孟浩然事迹新考·····	李 浩 (211)
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	郁贤皓 (220)
李白“东涉溟海”行迹考·····	竺岳兵 (229)
也谈李白诗中崔侍御·····	倪培翔 (243)
再论杜甫墓的位置问题·····	张中一 (254)
诗人包佶行年考略·····	蒋 寅 (263)
羊士谔生平及诗文系年·····	陶 敏 (274)
张祜生卒年和三入长安考·····	乔长阜 (288)

张籍生平二三事考辨	郭文镐 (296)
马戴生平考论	谭优学 (310)
《冯谱》《张笺》李商隐晚年事迹补正	周建国 (327)
温庭筠从游庄恪太子考论	牟怀川 (339)
李商隐玉阳山恋爱诗解	钟来因 (360)
李白《远别离》诗考释	朱金城 (391)
从艺术史料上窥探《太平广记》	魏明安 (402)
石刻所见唐代诗人资料零札	陈尚君 (417)
宋元唐诗选本考	孙琴安 (435)
“宛转蛾眉马前死”笺注指误	傅如一 (452)

唐诗学史之一瞥

• 陈伯海 •

唐诗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奇珍异宝，它的灿烂的光辉一直在后世人们的心灵上闪耀。一千多年来，围绕着这个宝藏，历代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了大量的发掘工作，无论在辑佚、选编、笺注、考证、解析、品评或其他方面的专题论述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述浩繁，不下几千种^①。可以说，唐诗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它也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词学、曲学等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课题、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考察这一发展的过程，总结历史的经验，将有助于我们今天更自觉地从唐诗的研究，推动唐诗学的建设。本文试将整个历史过程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一）唐五代——唐诗学的酝酿期；（二）宋金元——唐诗学的形成期；（三）明代——唐诗学的发展期；（四）清及民初——唐诗学的总结期；（五）“五四”以后——唐诗学的创新期。以下就按照这个顺序作一番粗略的巡礼。

（一）

唐诗的研究，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了。唐人不仅是唐诗的创作

者，也是最早的研究家。他们是怎样进行这一工作的呢？归纳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是选诗，二是品藻，三是述事。这也就是唐诗学的最原始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大家知道，选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传统，也是一时代文学创作繁荣发达的标志。作品数量多了，质量高了，吸引着广大的读者来诵习与揣摩，于是便有了“选”的需要。而选本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着选家的眼光和读者群的口味，“选学”便又成了文学批评的特殊形式。

唐代诗歌创作盛况空前，唐人选唐诗的风气也盛极一时。仅文献记载上有关唐人选编唐诗的本子，就有八、九十种之多。编选的年份起自唐初，迄于晚唐五代，历朝皆有，代不绝书。选诗的范围有专选一时期诗作的，如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有只录一地区作品的，如殷璠《丹阳集》、刘松《宜阳集》；有选某一流派诗的，如元结《篋中集》；有选某一类别诗的，如《朝英集》录饯送诗，柳玄《同题集》采省试诗；有取一类作者诗篇的，如崔融《珠英学士集》选武后时预修《三教珠英》诸学士之诗，蔡省凤《瑶池新咏》录妇女诗；有采一种体裁诗作的，如《三舍人集》专收绝句，倪宥《文章龟鉴》专取律诗；当然也有通选唐代诗歌的，如顾陶《唐诗类选》；可谓应有尽有，洋洋大观。编排体例上或以人为序，或以类相从，或同题唱和相属，或不同体裁分列，有的在选篇之下还附以诗人小传或评语，也是形态各别，花色繁多。

透过这些纷繁的表象，我们似可把这一时期的“选学”区别为两个相关联的阶段，即唐中叶以前和晚唐以后。大体说来，唐中叶以前的选本侧重于选唐诗发展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流派的作品，收录面较单一，缺少综贯的手眼。如今存《翰林学士集》残卷专收贞观时期唐太宗君臣的唱和诗，反映着唐初几十年间宫廷诗的概貌；佚名的《搜玉小集》杂采王、杨、卢、骆、陈、杜、

沈、宋诸家的篇什，更多地显示出高宗、武后时诗风转变的痕迹；殷璠《河岳英灵集》标举“风骨”与“声律”兼备的宗旨，体现了典型的“盛唐气象”；元结《篋中集》揭示“雅正”的主张，代表着沈千运、孟云卿一派追求古淡的趣尚；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鼓吹“理致清新”，实以“大历十才子”为楷模；令狐楚《元和御览诗》则又以供奉皇帝消遣为目的，所录皆新制的“研艳短章”。这些选本都属于唐诗演进时期的产物，它们只提供诗歌进展中某一侧面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仅不足为病，倒正可借此窥见唐诗演化的活生生的轨迹。

进入晚唐以后，随着诗歌创作高潮的过去，唐诗发展的总轮廓初步显现出来了，于是选诗也开始走向了综合。编成于宣宗大中年间的顾陶《唐诗类选》，便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部综合性选本。此书虽已亡佚，而根据《文苑英华》著录的顾陶序文来看，所选范围“始自有唐，迄于近殁，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为二十卷”，确是一部有一定规模的唐诗合选。序文中还分别就古、近二体列举了代表作家三十人的名字（后序中另述及当代作家十数人），特别提到“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鲜明地举起了宗尚李白、杜甫的旗帜。这一切表明，唐代“选学”确已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唐诗的综合研究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稍后，唐末韦庄撰成《又玄集》，录一百四十余家诗三百首，五代韦穀撰《才调集》，录诗千首，虽去取各有差异，也都是通括各朝的诗选。

与“选学”同步进行的，便是唐人品评唐诗的活动。品评的方式也有多种多样。有结合选诗开展评论，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各在诗人名下附以评语，概述其诗歌成就、风格特点，并摘赏名篇佳句。有通过记事作出评论，如唐人笔记中载录贺知章称叹李白《蜀道难》，号为“谪仙”，又顾况激赏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诗，为之延誉，这类例子甚多。有谈论诗法

时涉及诗篇，如唐中叶以后流行的各种《诗格》、《诗式》，常引唐人诗句作为讲明法式的例证。有凭藉序跋、书信等形式直接对诗人诗作发表意见，如白居易《新乐府序》是诗人对自己作品的诠释，而他的《与元九书》则还对李白、杜甫在内的其他作家加以广泛的评论。更有一种唐人首创的文学批评形式，就是论诗诗的写作，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韩愈的《调张籍》《荅士》等，都是以诗歌创作来从事诗歌批评、寓逻辑思维于艺术形象之中，也开启了后世研究唐诗的重要传统。总的说来，唐人对唐诗的各种论评，大多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发，尚缺少总体性的论断。讨论中有时涉及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如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里高度赞扬陈子昂变革齐梁颍风的功绩，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总结了盛唐诗歌重视“风骨”与“兴象”的经验，白居易《与元九书》倡导“风雅比兴”的论诗纲领，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标示了“搜奇抉怪，雕缕文字”的创作用心。这些议论显然已超越了一般品藻的范围，上升到诗歌理论的高度，但充其量而言，还是属于唐诗发展中的局部性问题，并非全局性的概括。

试图对唐诗加以全盘考察的动向，也只能萌生于晚唐以后。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中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复，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次之。元白力竭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话语不多，却综括了各时期唐诗的基本面貌。正如明胡应麟所指出：“唐人评鹭当代诗人，自为意见，挂一漏万，未有克举其全者。唯图此论，擷重概轻，繇巨约细，品藻不过十数公，而初盛中晚肯綮悉投，名胜略尽。后人综核万端，其大旨不能易也。”^②称誉未免过当，而把这段言论视

作对唐诗进行总结性评论的发端，还是恰如其分的。此外，唐末张为撰《诗人主客图》，对唐诗（主要是中晚唐诗）的流派作了初步的分析；齐己《风骚旨格》、徐衍《风骚要式》一类书风行于晚唐五代间，汇集了唐人作诗的技巧；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出现，探讨了诗歌创作的多种风格和意境。其实是从不同方面构成了对唐诗的总结。当然，这样的总结多半还停留在现象的整理上，尚未能从理论观念上明确把握唐诗的实质及其流变，以致唐诗学的建设也仍然处在明而未融的不成熟的境地。

选诗与品诗以外，记述诗人的事迹和诗作的本事，也是唐诗研究的不可忽视的方面。唐人述事有两种类型：一是给诗人正式立传，体现在墓志、碑文、行状、传记诸类文体中；另一是载录遗闻佚事，拾辍趣语琐谈，散见于各种笔记和杂文之间。前一方面材料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它经常成为后人考索唐诗人生平事迹的第一手依据。而后一方面的材料则颇近于小说家言，往往虚实杂糅，难以全然凭信。但只要肯下一番披沙拣金的工夫，仍可从中找到大量珍贵的史料。例如《隋唐嘉话》载武后夺东方虬锦袍转赐宋之问的故事，就生动地反映了唐初宫廷内部文学活动活跃的风气。《集异记》录王之涣等人旗亭画壁的传说，充分证明了唐代文人诗与妓乐之间的密切联系。而《鉴戒录》记杜荀鹤写《时世行》讽刺朱温的本事，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诗篇的写作背景，还显示了诗人思想性格发展的一个侧面。这些都是研究唐诗时必要的参考。还要看到，唐人笔记在内容上原很庞杂，并非单纯为诗歌记事。而到了晚唐，孟棻撰成《本事诗》一书，专一汇集有关诗歌创作的本事资料。五代时尚有人续作。这在笔记文发展上是一种创体，它把唐人述事明诗的传统发扬光大了，直接导宋人诗话之先河。我们认晚唐五代为唐诗研究进入初步总结的阶段，这也可算作一个标志。

(二)

唐诗研究至宋代出现了质的飞跃，不过为准备这一飞跃，事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北宋开国，承五代动乱之余，文物凋丧，卷帙坠散。宋人要研究唐诗，必须从辑佚理旧的工作入手。例如杜甫的集子，《旧唐书》本传记载，原有六十卷之多，后来亡逸了。宋初虽然有几种抄本留存，而编次紊乱，缺漏严重，传布也极不方便。北宋人整理杜诗的，先后有孙仅、刘敞、苏舜钦、王洙、王安石诸家。到仁宗嘉祐年间，王淇等人再就王洙所编二十卷本重加校核，雕板印行，这才有了杜集最早的定本，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基础。再看韩愈的集子，长期流传中散失不多，似乎比杜甫幸运。但五代宋初骈文盛行，韩集受到冷落，传世的几种抄本，讹夺零乱，脱略颠倒，几不可读。经穆修以二十余年心力整理、校勘，集资刊行数百部，方始得到流播，对北宋诗文复古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杜甫、韩愈是宋人最推重的唐代作家，其作品的收集、整理尚需经过这样的周折，其他诗人可想而知。而宋人在唐诗的辑校上投入相当精力，更利用印刷术的普及予以刊布（传至今日的唐诗别集多渊源于宋本），这不仅为保存资料作出了贡献，也给唐诗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整理唐人别集的同时，北宋还编纂了几种重要的诗文总集。李昉等修撰的《文苑英华》，是大型诗文合刊，录诗一百八十卷，汇存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姚铉选《唐文粹》，录诗仅九卷，而能自出手眼，独倡古调，得宋代诗文复古风气之先。稍后，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二十卷，选录一百零四家诗一千二百四十六首，尽管所选篇章未惬人意，而取材广泛，仍不失为有影响的唐诗选本；择存中晚唐人诗作居多，亦足以窥见有宋一代的趣

尚。

宋人在唐诗研究方面的业绩，还表现于诗话的创作。诗话之为体，集记事与品评于一身，灵活机动，无施不可，所以在宋以后得到了普遍的运用。不过北宋的诗话方从笔记体脱胎而出，述事的成分大于品评（这从汇集北宋人诗话的《诗话总龟》和《茗溪渔隐丛话》里也反映出来），不免限制了它的理论价值。当然，其中也不乏精到的评议。如《六一诗话》引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诸诗句，以说明诗人能事在于“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道理^③。《潜溪诗眼》举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例，阐释文章须讲求“法度”、“布置”。《石林诗话》亦引杜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与晚唐人诗比较，证明诗语固当“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这些意见都是发人深思的。但从唐诗研究的角度看，这时期的诗论也仍然缺少总体性思考，它们偏于探究唐人作诗的技巧、方法，尤其注重诗歌用语“出处”的考释，这跟北宋诗坛上以苏、黄为正宗的崇才学、尚法度的诗风，显然是分不开的。

南渡以后，家国之变一时给予士夫文人以巨大的冲激，回荡于文苑，便是对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④的江西诗派的反拨。人们迫切希望摆脱原有的程式，打开新的创作路子，于是唐诗被作为一种与“本朝人诗”相对立的传统提了出来，重新加以认识。这时候谈论唐人诗，已不仅着眼于它的炼字造句、用事作意，而更欲深入究明它的根本，找出唐诗之为唐诗的精神所在。因而，唐诗研究也就正式上升到了理论概括的阶段。

在这方面作出建树的，首推南宋初年的张戒。他在《岁寒堂诗话》中指出：“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

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又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张戒推崇李、杜诗，主要是从儒家“诗言志”的观点上立论的，并未能确切地把握住唐诗的美学特点，但他明确划分了唐诗与宋诗的界限，便于人们去进一步探求唐诗的真面目，更切实地了解唐诗。

自张戒发难之后，公开批评宋诗流弊、转趋唐人的倾向，便日益滋长起来。如杨万里称赏晚唐诗的“诗味”^⑥，陆游讥刺江西诗的“琢珣”与“奇险”^⑦，朱熹辨析苏、黄与唐人诗的异同^⑧，叶适为“永嘉四灵”的复倡唐音作鼓吹^⑨，下而及于姜夔、戴复古、刘克庄、赵汝回诸人，都发表过类似言论。不过这些人中间，或则倾心于晚唐，或则更拟超轶唐代而上追汉魏，自难免使他们探究唐诗的眼光受到局限。打破各方面的拘束，真正突出了唐诗地位的，不能不数到《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

严羽论诗，以师法盛唐为主旨，由此出发，述及有关唐诗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首先，他将汉魏以至唐宋间的诗歌区别为四个类型，从相互比较中阐明了唐诗的特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他把“尚意兴”作为唐诗的主要特征，指示人们从诗中去追索那种“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虽然偏于就诗歌艺术方面着眼，倒确实抓住了唐诗美学品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鲜明地树立起唐诗之为唐诗的基本观念。这在唐诗研究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其次，严羽对唐诗本身的流衍变化作了全面的考察，初步划分出唐初、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五种体式，实际上也就是唐诗发展的五个时期。这比司空图原先的概述要明确得多了，不仅可以看作唐诗分期的肇始，也直接成为